

# 顾颉刚通史编纂中的中华民族意识

王艳勤

**【摘要】**在20世纪的风云变幻中,顾颉刚撰述中国通史的努力,是诸多史家借由通史写作表达中华民族意识的一个缩影。五四时期,顾颉刚继承了晚清以来梁启超开创的“以民族为历史之主脑”的新史学传统及其对中华民族命运的思考,在教科书编纂中给予民族问题“第一次粗略的注意”。“九一八”之后,顾颉刚萦绕心头的工作之一便是“为全中华民族编一部通史”,他理想中的中国通史因之在编纂目的、编纂体系与编纂策略上有着显见的时代特色。新中国成立后,顾颉刚发愿整理中国民族史,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和民族平等团结政策为顾颉刚整理民族史料提供了方法指导和现实依据。时移世易,顾颉刚始终坚持在统一国家的立场上认识中华民族及其历史形成,以中华民族的整体性和连续性为前提书写中国通史,对我们今天在唯物史观指导下编纂中华民族史仍是可资借鉴的。

**【关键词】**顾颉刚;中国通史;民族史;中华民族意识

**【作者简介】**王艳勤,女,中南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副教授(武汉 430074)。

**【原文出处】**《民族研究》(京),2023.3.125~134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近代中华民族研究的学术系谱研究”(项目编号:21BMZ118)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清季尤其是民国肇建以后,编纂新式中国通史以凝聚民族精神成为各派史家共同的选择,其中新考据派史家顾颉刚对通史撰述的执着颇值得注意。顾颉刚一生的学术与社会事业主要涉及古史研究、民众教育和边疆史地,这三个方面在他的一生中相互缠绕、互补共生。限于时势、个性和境遇,顾颉刚在学术事业和社会服务方面虽常有分身乏术的苦恼,但在激发民族意识加强民族团结的问题上,二者应该说达到了高度的统一。他在古史研究中发掘民族融合的轨迹,在民众教育中促进中华民族意识的萌发,在边疆史地中寻找中华民族一体的依据。将古史研究与边疆史地研究的成果以通俗的方式写进中国历史,在民众中传播中华民族的历史与文化,凝结成编写一部中国通史的愿望,成为顾颉刚一生割舍不去的学术情结。已有研究者注意到通史编纂作为顾颉刚史学人生中一种未竟的志业在20世纪中国通史编撰史上的地位,<sup>①</sup>但对贯穿顾颉刚通史编纂中的中华民族意识关注不够。而既往对于顾颉刚民族

观念的研究,尤为偏重其西北考察及其后关于“中华民族是一个”的论争,<sup>②</sup>虽有成果在近代史学的发展脉络中将触角延及顾颉刚20世纪20—30年代的中华民族研究,<sup>③</sup>但将其通史编纂中的民族思想置于时代变迁和顾颉刚学术事业的整体演进中,对其中的变与不变进行考察仍有讨论的余地。本文拟沿着时代变迁的脉络,观察顾颉刚通史编纂中的中华民族意识如何因应时代而生发,借以管窥知识分子在知识与制度转型背景下对民族问题的探索路径。

## 一、“第一次粗略的注意”:五四时期的《现代初中教科书·本国史》与《国史讲话》

1939年,顾颉刚在阐发“中华民族是一个”的民族理论时回忆说,他对于边疆民族问题“第一次粗略的注意”是在1922年。是年他为商务印书馆编《现代初中教科书·本国史》(以下简称《本国史》),因为“很想在这部书里给予中学生一些暗示,使他们增进对于自己民族前途的自信力”,“所以整部的中国历史的主要问题就是内外各族的融合问题”。<sup>④</sup>顾颉刚的

回忆大体无误,在全面抗战的危局中,尤其是在“中华民族是一个”理论争鸣之时,尤显十七年前《本国史》将民族融合视为中国历史核心问题的学术洞见。

自编书伊始,顾颉刚即以“历史教科书中的大革命”自期。<sup>⑤</sup>所谓“革命”,一是联合北大新派师友如胡适、傅斯年、潘家洵等,编出一部符合新史学潮流的文明史,以示与国史编纂处老派教师国史编纂体系立异之意图,将五四时期新派史学不迷信官书,甚至刻意反对官书的态度表达得淋漓尽致;<sup>⑥</sup>二是一反传统教科书的政治史模式,以“民族离合的关系”为要,<sup>⑦</sup>以民族史为主干来构造中国通史,主旨“是要说明中国民族性质与生活的来源,又叙述他的逐渐演化之迹”。<sup>⑧</sup>1922年4月10日,顾颉刚分别致信潘家洵和傅斯年,与他们讨论中国通史的编纂问题,基于对旧史中“种族”问题的不满,他请潘家洵代购若干图书,其中包括“一部好一点的中国通史”“一部中国种族史”“一部中国与东亚各国及西洋之交通史”,<sup>⑨</sup>这些参考书大体可见顾颉刚心中对于中国通史的构想——在世界史的眼光中勾画中国通史,内中将“种族”问题作一通盘考虑。1922年底至1923年底,顾颉刚入商务印书馆编译所任编辑。入馆几天后,新学制颁布,商务印书馆为了赶出新式教科书抢到春季始业时的生意,限令编译所的所员们在二十天内编出各种教科书的第一册,这显然不符合顾颉刚勤力编教材的构想,对商务颇为失望,不久就从商务辞职了。历史教科书交给王伯祥接编,王伯祥以他在集美师范定的纲领为蓝本进行编纂,内容仍偏于政治方面,让顾颉刚深感遗憾。

客观地说,顾颉刚所谓“粗略的注意”并非完全是谦辞。《本国史》的编纂,适逢新文化运动后期思想分化之际,这一时期除了新旧之间的竞争而外,新与新之间也各各不同。顾颉刚编纂《本国史》的心路历程中,除了与老派立异,也有与同属新派的合作者王伯祥不尽一致的地方。在与商务合作的过程中,又遭遇商务改革中的新旧嬗递与生意和启蒙的矛盾。

尽管如此,《本国史》因着各方师友的支持和顾颉刚的坚持,还是在一定程度上表达了顾颉刚的编

史理念。<sup>⑩</sup>该书依据西方近代文明史观,以民族的演进为基本线索,以汉族和周边民族的关系为分期标准,将中国历史划分为“域内文明的成人时代”“中国民族文化的蜕变时代”“中国民族的争存时代”“东西文明的接近时代”“中国文明之世界化时代”,<sup>⑪</sup>总体上沿袭了晚清以来以桑原鹭藏《中等东洋史》为范本的分期模式。不同于桑原在叙述中原王朝与周边民族关系时不分主次的表述,《本国史》延续了传统夷夏之辨华夏—蛮夷的等级秩序和以汉族为我者以他族为异族的内外结构,强调汉族对异族具有强大的同化力。

“总说”在全书具有提纲挈领的意义,根据旧史记载和西人成果对中国历史上民族的构成、起源、沿革和分布展开了专门讨论。清末以来中外对于中华民族的构成与起源众说纷纭,顾颉刚以风俗言语血统作为民族的标识,认为中华民族是由“华、苗、东胡、蒙古、突厥、藏、韩七族”构成的,“七族之中华族是主要的分子”,“所谓华族,只是一个大共名,里面包含着无数历史上被同化的民族”。关于中华民族的起源,顾颉刚的思路延续了晚清以来的外来/原住模式,但对于“这七族是否同源,是否就地孳生还是由别处迁来”,<sup>⑫</sup>谨慎地持保留态度,较他1923年古史辨纲领“打破民族出于一元的观念”稍显犹疑。

《本国史》留下的遗憾,在两年后得到了弥补的机会。1924年10月—1925年10月,孔德学校邀请顾颉刚编纂历史讲演稿,尽管顾颉刚正忙于奠定其后来学术地位的古史辨事业,但他“在极忙中也乐意承受”,因为“国史讲话的编纂”正契合他“把本国史全盘整理一过”的学术路向。沿着这一路向,他计划先从两年前编纂《本国史》所拟的八十题中选出“宋代各种族的关系”一题,分成“契丹势力的南渐”3篇,“西夏的始末”1篇,“女真的勃兴”2篇,“成吉思汗”2篇,共计8篇。<sup>⑬</sup>正式出版时又增加“宋代的统一”1篇,“蒙古领土的扩张”3篇,总数增至12篇,主要从“种族”和政治方面讲述了宋(汉)、辽(契丹)、西夏(西羌)、金(女真)、元(蒙古)的兴衰。<sup>⑭</sup>从主题的选择、章节的安排和内容的不断扩充来看,中华民族的扩大

和统一在顾颉刚的历史意识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这正是他在《本国史》中未及表达的内容。

《国史讲话》的时间范围仅涉及宋元三百年,是一部未完成的中国通史,可以说是顾颉刚以“中国民族是否确为衰老,抑尚在少壮”为骨干问题编纂中国通史的一次不完全尝试,但其意义不容低估。宋元三百年间,从宋代的统一到元世祖再次统一中国,是中国作为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历史上一个重要的时期,如何认识这一时期中华世界的分裂与统一,至今仍被学者目为中国历史的“叙述之难”。<sup>⑤</sup>顾颉刚以民族史的眼光将北方民族政权与宋看做有宋一代中国史内部的“种族”问题,在坚持正统史观的同时,赋予非汉民族政权应有的历史地位,构建了一幅由多民族竞争而趋向统一的历史画卷,确认了中华民族在中国历史中的主体性和连续性,同时也将中国历史的丰富性和差异性蕴含在整体性中。几年来盘桓在顾颉刚心中的“最重大的历史问题”不仅落实为宋元历史的学术探讨,更成为顾颉刚书生救国的现实抓手,如果说宋元时期的北方民族为衰弱的汉族注入了新血液,近代以来汉族以外“未开化的种族”则是陷入危机之中华民族的“生路所在”,他据此断言中华民族仅是“病的状态,而不是老的状态”,“中国的前途终究是有望的”。<sup>⑥</sup>顾颉刚或许并未察觉,他的乐观隐含着迥然不同于《本国史》及当时多数学者以汉族同化“异族”为历史常态的思路,“异族”反倒成为汉族和整个中华民族重振的希望。

《本国史》和《国史讲话》是顾颉刚以中学生为目标群体的中国通史撰述。五四时期历史学专门化、职业化和科学化的知识追求和新学制推行的制度变革一起,推动了以顾颉刚为代表的主流历史学家,在整理国故的旗帜下按照新史学对历史的崭新定义,书写现代意义上的科学史学,在“写什么”的层面上继承了晚清以来梁启超“以民族为历史之主体”的新史学传统,在“怎样写”的意义上接续了晚清模仿欧洲万国史体例编纂新式中国通史的国家史范式。

## 二、“为全中华民族编一部通史”：“九一八”后编纂中国通史的努力

“九一八”后,顾颉刚受国难刺激,不再抱持“为学问而学问”的态度,而是以救亡图存为目标,在古文典册之外求经世之学,萦绕心头的工作之一便是“为全中华民族编一部通史”,<sup>⑦</sup>亡国灭种的危机感和“求中华民族之复兴”的责任感,使得顾颉刚理想中的中国通史<sup>⑧</sup>在编纂目的、编纂体系与编纂策略上有着显见的时代特色。

顾颉刚编纂通史的目的是通过传播历史知识,塑造民众的民族意识,增强民族自信力,复兴中华民族。1932年3月12日,顾颉刚写信给洪煊莲,其中谈到编民族史事,因为“改造中国历史,即可以改造一般民众的历史观念”,民族史作为重写中国通史的一种叙事结构在他看来是改造历史的首选,它意味着以中华民族作为连续性主体来叙述中国历史,可以“为我民族立一坚确的自信心,永远不受外族的摧毁”。<sup>⑨</sup>通史编纂作为时代赋予历史学家的使命,是晚清以来历史书写走出日本模式的学术自觉,更是强烈的民族主义关怀使然。“过去中国通史一类的书籍,差不多都是以日本人的著作为蓝本写的,这是历史学者的一个奇耻大辱”,“编著通史的目的,在于发扬中华民族以往光荣的史实,振励今日的信心,而遥寄将来的希望”。<sup>⑩</sup>

顾颉刚编纂中国通史的强烈愿望,不仅是民族危机背景下知识分子走出书斋的责任担当,更是民众中华民族意识觉醒的普遍要求。“九一八”后由于中华民族意识的普及化和社会化,人们对于通史阅读的需求增强,常常有人请他介绍可读的中国通史著作。在民族意识高涨的背景下,顾颉刚深切了解民众对于通史的期盼:“大家希望有一部《中国通史》出来,好看看我们民族的成分究竟怎样,到底有哪些地方是应该归我们的。”<sup>⑪</sup>他由此意识到地理与历史、地理与民族的不可分割,于1934年创办了《禹贡》,借以作为中国通史的基础。

顾颉刚拟定的中国通史编纂体系在叙述框架上分为上世、中世、近世三编。上世史以中华民族与文

化之形成为其中心论题,中世史以中华民族之扩大为其中心论题,近世史以中华文化之转变及其与全世界之关系为其中心论题。<sup>②</sup>如果说前两编的重点是书写历史上中华民族的荣光,第三编则是对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复兴的回望,一部中国通史就是一部中华民族演进史,也是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历史,不仅确立了中华民族作为中国历史主体的整体性和连续性,还在历史—民族—文化的三维互动中体现了世界史的眼光。

以何种知识填充以及如何成就这一相对理想的通史框架?顾颉刚认为,编纂内容应该“不以汉人为本位,而以中华民族全体的活动为中心”。<sup>③</sup>所谓中华民族全体,是要沟通边疆和内地,在历史书写中给少数民族以平等的地位。在他看来,汉族本位的历史书写,在史料、史识、史观上都充满了偏见,用的是内地人的眼光,怀的是内地人的成见,采的是内地人的材料。因此,“只见君相,不见民众,只见中原,不见边疆,以致形成了偏枯之疾”。<sup>④</sup>通史应该适合于全国公民之用,他期望用平等的眼光记载各族的历史事实,凡是共同享有的光荣和被迫承受的耻辱都应当详细抒发撰写,而摒去一切的私怨。

在史料上,顾颉刚尤其重视搜集少数民族地区和少数民族语言的史料。他认为汉文化“廿四史”记载很详细,但其可能抹杀了边疆的真事实。关于边疆史料,他认为不是没有,“只是没有搜集,没有翻译,大家看不见”,<sup>⑤</sup>蒙藏寺院里的史书、少数民族的传说等口传史料在他看来都很重要。一方面,他依托刊物、学校、研究机构、学术团体等,在教学和研究中搜集整理民族史料。《禹贡》中的民族问题专号、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编辑中国民族史材料集的研究计划和实习内容、参与创立边疆学会搜集边疆史料,都是通过搜集旧史书中的民族史料和边疆调查,为将来编纂通史、熔铸国族作铺垫。另一方面,他积极鼓吹,号召边疆同胞参与进来。因为边地方面主要是口传史料,而文字记载或藏在隐秘,或为已不通行的古文字,所以需要边疆同胞自己搜集。

在方法上,以平等的眼光看待调查研究和文献

考证,重视调查对于史料搜集和历史解释的意义。早在1927年,顾颉刚就表达了对此前编纂《本国史》和《国史讲话》未能尽如所愿的遗憾,他希望第二次编通史时,“政府里派我到各处游历,实地搜集材料”。<sup>⑥</sup>1931年的辛未仿古,让顾颉刚深切感受到实地考察对于通史写作的意义,稍后他开始通过《禹贡》学会引导其他学者重视调查。在他的带领下,截至1937年,《禹贡》对于西北回教、西南康藏、东北史地、北边国防、河套水利、南洋华侨等问题,均经调查研究,而此后三年的研究计划中,相当一部分精力集中于边陲民族史,包括相关史料之搜集,西人研究之翻译,边陲民族史之研究等,旨在“明了中国整个民族发展之真相”。<sup>⑦</sup>

在中华民族历史观上,以中华民族文化的包容性、整体性和连续性为前提认识中国历史。包容性是整体性和连续性的根柢,整体性和连续性是包容性的结果。历史中国分裂与统一参差交替,分裂后仍能统一并且历经分裂时期的民族斗争与融合形成了更大范围的统一,顾颉刚将中国历史的这一特殊性归因于中华民族强大的向心力和包容性,中华民族因其“大度包容”,所以“纠纷是一时的,表面的,而统一则是经常的,永久的”。<sup>⑧</sup>他以中国历史为经验支撑创发了“雪球”理论,自秦皇统一之后,中华民族像雪球一样越滚越大,中国和中国人“无论地方势力怎样的分割或是朝代怎样的递嬗,它总是不变的”,成就了中国的“整个性和永久性”。<sup>⑨</sup>“越滚越大的雪球”这一意象在静态层面指向中华民族的向心力和包容性,在动态意义上即中华民族“同化”史,“中国民族永远在同化过程之中,也永远在扩大范围之中,也就永远在长生不老之中。”<sup>⑩</sup>中华民族演进史被视为生物有机体的成长过程,而“同化”是中华民族一体化进程保持生机和活力的有效机制,所谓“同化”是汉族和少数民族之间的杂居交融,是边民文化与生活的现代化。<sup>⑪</sup>“长生不老”在中国文化中是一种具有神圣意义的象征性表达,它隐喻了中华民族的绵延不绝。因此,对历史上汉族和塞外诸族相互斗争和相互融合的过程作有系统的研究是最重要的一

件事,他希望各族都要明白,在历史上中华民族是不可分离的,从文化上中华民族是一个倾注融化的大集团,<sup>③</sup>“中国人民”虽然分为汉、回、藏三个文化集团,但三者没有清楚的界限而且是互相牵连的,三者统一于“中华民族文化”。<sup>④</sup>

由于通史编纂意义重大而难度又高,顾颉刚编纂中国通史尤为讲究策略:一是追求通俗化。所谓通俗化,在史学观念上,要以演义的方式编一部活的、“以人为中心”的历史;在读者群体上,要面向中小学生,面向少数民族;在语言表述上,要有合理的想象,以文学化的语言引起兴趣;在表现形式上,要采用图画、摄影等民众喜闻乐见的形式。二是学人合作,“联络同好,共同撰写,而刚总其成”。<sup>⑤</sup>通史编纂是一件大事,非一人一生所能就绪,顾颉刚编纂中国通史,有着成功不必在我的气度,乐于组织学者通力合作分阶段完成。基于实证史学对于材料的审慎和顾颉刚对史学救国功能的倚重,他理想中的国史须“整理旧材料,创作新史书”。<sup>⑥</sup>《中国名人传》最终成为“创作新史书”的第一步,目录累经商榷,自周迄清共二百余题,所选人物分为“陶铸国族者”“创造吾文化者”“砥柱中流者”“济人利物者”,计二百册,由顾颉刚联络同好以通俗的方式分阶段写就,完成之后合为一书即为“《中国通史》之雏形”。<sup>⑦</sup>传记是中国传统史学极为重视的一种写史方法,抗战时期传记文学发达,往前追溯,梁启超亦曾设想从历史中选出一百个人来做专传,以为撰写中国通史之基础,顾颉刚显然延续了这一思路。倾注了大量心血的《中国名人传》因其通俗性在社会上反响良好,部分实现了顾颉刚的通史撰述构想。

抗战结束后,顾颉刚对通史的热情不减反增。1947年,55岁的顾颉刚为自己规划了此后15年的研究计划,重心即是中国通史的编纂。他计划中的这部通史相当宏富,针对不同层次的读者有七种不同的方式:给小学生、初中生、高中生、大学生及其相应程度者看的,分别用连环图画、故事体、演义体、(当时通行的)通史体;除此之外,给专家及高级的大学生看的,是讨论问题并考证材料的通史;给边疆人

民看的,是边族与汉族分量差不很远而足以鼓起其向心力的通史;给世界人士看的,是偏重文化而足以使其认识中国在世界中的地位的通史。虽然时局不稳,而他也因病在徐州休养,他对这个计划充满信心,甚至对通史的出版、发行、修订、版税都做了规划。<sup>⑧</sup>

总体上,顾颉刚的中华民族意识在“九一八”后更为清晰,逐步强化,这一点在其以“全中华民族”为历史主体的通史撰述计划和实践中时有体现。尽管他并未真正编纂出一部展现中华民族全部活动的中国通史,但他注重通俗化书写中国通史的思想、分阶段合作完成通史撰述的策略,既在一定程度上显示了中国通史书写的困难,也以另一种方式阶段性完成了他的目标。

### 三、“为真正的通史计”:新中国成立后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整理中国民族史的宏愿

编写中国通史的工作因为种种原因延宕下来,有研究认为,顾颉刚在20世纪50年代后因意识形态层面的限制放弃了这一学术志业,所作的计划中很少见到中国通史编撰这一项。<sup>⑨</sup>实际上,旧史家顾颉刚在新中国成立后仍然挂怀中国通史的写作,但如何因应时代变迁调整史观和研究方法成为他书写历史时首先面临的挑战。

新中国成立伊始,在史学领域中,由马克思主义史学引领史学研究潮流的趋向已定,但究竟如何编写一部适合新时代人民阅读的通史,仍在摸索和讨论中。1950年5-6月间,顾颉刚应赵纪彬之邀作《顾颉刚自传》,在其自传中他阐述了自己的治学计划,除了整理古史和研究古史外,让他耿耿于心的一项工作是整理民族史,尤其是《中国民族史料集》的编辑。如他所言,这是他主持禹贡学会和边疆学会时遗留下来的志愿。他希望整理二十四史中的相关材料,编出一部民族名、地名、人名、器物名的《民族史辞典》,把整理的结果作成一部不完全的《中国民族史》,来说明中国民族为多种民族所结合,中国文化为多种民族文化所融汇而成的情形。他感觉新中国的民族平等政策为实现这一目标提供了契机,因而

满怀激情地写道：“为我们国家联合各民族计，指导各民族得着其自己民族的正确历史计，为将来的著作家汇合了各民族的史实以写成一部真正的《中国通史》计，这基本的工作是不能少的。”<sup>③</sup>即便如此，顾颉刚也并不盲目乐观，他历数了完成这一计划的困难和对策，大体思路和研究方法都延续了民国时期的构想，仍主于资料的整理和考订。

1950年12月27日，顾颉刚接到叶圣陶来信，内中专门谈到了通史编纂的问题，但此时中宣部、教育部和中国科学院各机构对于如何书写历史尚未形成一致的意见。<sup>④</sup>及至次年，郭沫若在中国史学会成立大会上说，中国史学“在历史研究的方法、作风、目的和对象各方面，都有了很大的转变，中国的历史学已创造了一个新纪元”，<sup>⑤</sup>并具体指出了六个方面的转变，历史学的发展方向就比较明确了。顾颉刚作为民国时期实证史学的一员健将，在此前的通史编撰当中首重史料，不甚措意于史观，<sup>⑥</sup>但他此时明显感受到了唯物史观作为“新史学的方向”所带来的冲击，认识到自己以前的工作“搜集材料有余，理论和方法都不够精确”。<sup>⑦</sup>

在此后的学术生涯中，顾颉刚虽偏重于古史研究，但也不忘努力于民族史资料搜集，并逐步抛弃了以往“超阶级的纯学术观点和个人英雄主义的偏见”，<sup>⑧</sup>尝试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方法审视和整理。顾颉刚在抗战时期颇为推崇《三国演义》，这时因为“学习马克思主义之后不愿接受这类书的立场、观点”，进而主张动员地方力量发掘地方史料，“在各地、各民族间做好写史的工作，作为他年写作中国通史的基础”。<sup>⑨</sup>自1954年当选为政协委员后，他多次提交议案为通史编纂搜集整理民族史料。顾颉刚尤为重视少数民族的传说，他以阶级的观点筛选二十四史中的民族史料时发现，“兄弟民族”的历史“写在记载里的大都已被反动统治阶级所歪曲，其住居在偏僻地区的或者竟是一片空白”，因此他在全国政协二届一次会议上提议重视搜集少数民族的传说。<sup>⑩</sup>1962年12月29日，《北京晚报》上一则简短的新书推介，引起了顾颉刚的注意，云南省委组织了民

族民间文学丽江调查队，对纳西族文学进行发掘、搜集和整理，其成果纳西族史诗《创世纪》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该书记录的纳西族洪水传说，与顾颉刚幼年所见夏曾佑《中国古代史》中所记云南彝族的洪水传说有异，他决定要一探究竟。与口头传说相辅相成的是民族语文记载，顾颉刚在民国时期就提倡搜集不同语言的民族载籍，新中国实现了国家统一，实行民族平等政策，开展民族调查，为搜集民族语文史料提供了良好的社会条件。1960年4月4日，顾颉刚在全国政协三届二次会议的议案中，提议北京图书馆尽力搜集国内各少数民族的图书，文化部在答复中予以认可。<sup>⑪</sup>

本着历史为人民服务的思想，顾颉刚延续了民国以来历史书写的通俗化策略，借助通俗读物在民众中开展历史教育，强化民众的中华民族意识。1951年3月18日，他在中国新史学研究会上海分会“爱国主义与历史教育座谈会”上发言，着重阐述了历史教育对于转合人民心志、激发民族自信的意义，主张在国家指导下，抛弃以个人为本位的史书编写方式，先搜集劳动人民的成绩和民族光荣与耻辱的史迹，用歌曲、模型、影片等人民喜闻乐见的形式书写历史。<sup>⑫</sup>为了编出一部中国通史演义，自20世纪30年代始他先后请郑侃慈、吕叔达、陈懋恒写作此书，这一愿望在二十多年后的1954年终于由陈懋恒完成了。这本书在顾颉刚看来，算是他二十多年的愿望的第一块奠基石，尽管不大合乎理想，但可由此“逐渐建筑成一座蔽风雨的小屋，更许由于这座小屋而引起了另外无数的钢骨水泥的大厦”。<sup>⑬</sup>

在历史唯物主义的指导下，顾颉刚研究中华民族历史和文化的成果集中体现在《中国史学入门》一书中。这是1965年12月15日之后的二十多天里，顾颉刚在北京香山疗养院为何启君讲解中国史的笔记，全面而又深入浅出。其中，“中国民族史概要”以中华民族的形成、壮大和发展作为历史主线勾勒了自商迄清的历史进程，“略谈中国古代社会”则专门讨论了“中国”、“中华民族”的渊源。依据文献记载、最新的考古发掘和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形态的理

论,他以“华夏”为“汉族之老祖”,把中华民族的形成追溯到商代,把中国历史看成中华民族发展史。在简短的讲解中,他反复强调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的大整体”,“是在中国领域共同生活的各族人民的总称呼”。顾颉刚对“具有悠久历史与光荣辉煌的中华”深感自豪,他对于民族的理解,在援引斯大林“四个共同”(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和共同文化)的定义基础上,打破教条主义,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对中国历史上的民族问题进行分析。关于中华民族的起源,自20世纪初即有一元论和多元论两种观点的交替发展,不同于顾颉刚在抗战时期只谈中华民族的整体性甚至谨慎使用“民族”二字的处境,在新中国民族平等的政策下,顾颉刚得以把民族起源的多元论和中华民族的整体性有机结合起来。但在民族起源问题上,顾颉刚仍未完全摆脱民族西来说的笼罩,他以帕米尔高原为人类的发祥地,认为中华民族以黄河流域为中心有一个自西向东进而自北向南的迁移过程,这一过程仍是以汉族为中心同化东西南北各少数民族的过程。<sup>⑨</sup>

新中国的民族平等团结政策和民族识别为顾颉刚整理民族史料提供了现实依据。1971年4月7日,顾颉刚接到周恩来的批示,标点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他在随后的建议中指出应该按照新的民族政策和民族称呼,避免对少数民族和各邻邦的侮辱的言词。<sup>⑩</sup>他特别提出,“要打破唯心史观的局限性”,“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作为批判的标准”,把“偏统”政权的史书纳入其中,其他的所谓“别史”和“杂史”,如蒙古族的《元秘史》,金毓黻的《渤海国志》也讨论选收。对于尚未有人进行系统叙述的南诏、大理等国,他提议由云南大学的方国瑜就地调查,补行编纂。对于民族问题复杂的元、明、清史,他也特别提出了对策。<sup>⑪</sup>这一提议的重大意义不应被低估,民国时期主流的历史叙述始终难以摆脱“汉化”框架的束缚,直到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通史著作大都把辽、金附于宋代部分之后而顺便提及,<sup>⑫</sup>顾颉刚将“偏统”纳入中国历史叙述主流脉络之

中,等于在历史叙述的层面确认北方民族政权的“中国性”和中华民族在历史上的整体性,是对新中国成立后马克思主义史家提出的中国作为统一多民族国家这一观点的强力呼应,是新中国民族平等与民族团结政策在学术领域的集中体现。

#### 四、结语

在20世纪的风云变幻中,顾颉刚撰述中国通史的努力,是诸多史家借由通史写作表达中华民族意识的一个缩影,是晚清以降学术界在“民族—国家”框架下重建统一多民族中国历史叙事的一种探索。顾颉刚继承了梁启超在20世纪初开创的以民族史为主干的中国史叙事模式,以中华民族的形成和演进为线索来书写中国历史,成为诸多历史叙事中引人瞩目的一种取向。他在五四时期的教科书编纂中初步尝试将中国历史的丰富性蕴含在整体性之中,在抗战时期因为空前的民族危机和中华民族观念的普及更偏重中华民族的整体性和连续性,新中国成立后,民族平等政策和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引导,使得顾颉刚对中国民族史的编纂有了新的理解,能够更全面地处理中华民族起源的多样性和中华民族历史的整体性问题。随着时代变迁和知识与制度的转型,顾颉刚不变的是民族情怀,他心目中真正的中国通史始终以中华民族的整体性和连续性为前提,在统一国家的立场上认识中国及其历史形成。为了提高民众的民族自信力、提升中华民族的凝聚力,他希望编写的中国通史在不同时期都有着通俗化的外在形式和切合中华民族的内在要求。

顾颉刚的一生受时势、个性、境遇的影响,在通史编纂问题上,像他自己常说的那样,由于中国地大物博、历史悠久,书写通史本就困难重重,加上他的“性情太喜欢完备”,对史料搜集的苛刻要求、对通俗表达的特别追求,顾颉刚终其一生未能写出他理想中的中国通史,但他为之努力的一生留下了诸多可圈可点的阶段性成果,对我们今天在唯物史观指导下编纂中华民族史、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仍是可资借鉴的。

## 注释:

①马建强:《抗战中顾颉刚在西南学、政、商三界的通史经营》,《齐鲁学刊》2016年第2期;李长银:《未竟的志业:顾颉刚与中国通史编纂》,《史学月刊》2014年第1期。

②李大龙:《对中华民族(国民)凝聚轨迹的理论解读——从梁启超、顾颉刚到费孝通》,《思想战线》2017年第3期;兔平清:《“中华民族是一个”理论与顾颉刚民族思想的学术转向》,《中共党史研究》2021年第3期。

③汤莹:《顾颉刚的“民族不出一元论”及其影响》,《史学月刊》2017年第8期;景凯旋:《顾颉刚民族与边疆思想述评》,陕西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16年;罗新慧:《顾颉刚先生对古代民族融合的考察》,《史学史研究》2011年第2期;姜萌:《影响民国史家书写“民族问题”的三个因素——从吕思勉对傅斯年与顾颉刚的批评说起》,《史学史研究》2019年第4期;罗新慧:《顾颉刚先生对古代民族融合的考察》,《史学史研究》2011年第2期;兔平清:《论顾颉刚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思想:以民族史编撰为中心》,《史学集刊》2021年第3期。

④顾颉刚:《我为什么要写“中华民族是一个”》,《宝树园文存》卷4,《顾颉刚全集》,中华书局2010/2011年版,第109页。以下凡引《宝树园文存》、《顾颉刚古史论文集》、《顾颉刚书信集》、《顾颉刚日记》等,均出自《顾颉刚全集》,不再注明。

⑤顾颉刚在给王伯祥的信中称他们编重编国史的做法“必可使中国历史界起一大革命”。顾颉刚:《致王伯祥:自述整理中国历史意见书》(1921年6月9日),《顾颉刚古史论文集》卷1,第176页。顾颉刚:《致潘家洵》(1922年5月28日),《顾颉刚书信集》卷1,第172页。

⑥顾颉刚:《致傅斯年》(1919年8月11日),《顾颉刚书信集》卷1,第184页。客观地说,国史编纂处并非“旧”的代名词,内中的屠寄、张相文、刘师培等虽属旧派,但亦不乏学贯中西之新派人士。因附设于北大,且由蔡元培亲主其事,学术气氛浓厚,总体上他们对于通史的纂辑是以新史学自认的。

⑦顾颉刚:《中学校本国史教科书编纂法的商榷》,《宝树园文存》卷3,第21页。该文发表于《教育杂志》,1922年4月20日。

⑧顾颉刚:《致李石岑》(1921年7月8日),《顾颉刚书信集》卷2,第86页。

⑨顾颉刚:《致潘家洵》(1922年4月10日),《顾颉刚书信集》卷1,第170页;顾颉刚:《致傅斯年》(1922年4月10日),《顾颉刚书信集》卷1,第190页。

⑩《本国史》由顾颉刚、王钟麒合作完成,但编纂大纲、主要材料、基本观点皆由顾颉刚所出,尤其是《总说》和上册(上古史部分)系顾颉刚编写。该书第2版,即1929年版由王伯祥单独署名的《新时代本国历史教本》最大的变动,就是总说和上古史部分。参见王红霞:《〈现代初中教科书·本国史〉与顾颉刚的史学思想》,《史学月刊》2014年第8期。

⑪顾颉刚、王钟麒:《现代初中教科书·本国史》(上),商务印书馆1925年版,第18-23页。

⑫顾颉刚、王钟麒:《现代初中教科书·本国史》(上),第10、13页。

⑬顾颉刚:《编纂国史讲话的计画》,《宝树园文存》卷3,第53-54页。

⑭顾颉刚:《国史讲话·宋蒙三百年》,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

⑮江涓:《怎样认识10至13世纪中华世界的分裂与再统一》,《史学月刊》2019年第6期。

⑯顾颉刚:《古史辨第一册自序》,《顾颉刚古史论文集》卷1,第77-79页。同期,顾颉刚和王伯祥还共同拟定了高中阶段和师范阶段后三年(相当于高中)的中国史学习大纲,同样以文化史为核心,将历史分成民族、政治、经济、学术、宗教、社会风尚六个方面。从排序和篇幅来看,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在重大历史事件的排比中成为焦点。参见《高中师范科师范后三年公用本国史课程纲要》,《宝树园文存》卷3,第57页。

⑰顾颉刚:《告河西、潢川、黔江三中学校学生须注重史地书》,《宝树园文存》卷4,第157页。该文系1941年12月12日代朱家骅作。

⑱1946年,顾颉刚以百年为断(1845-1945)对中国史学作了一个回顾,在他看来通史撰述只有几部是“较近理想的”。据不完全统计,仅1931至1945年间就出现了四十余部中国通史著作。但顾颉刚在1946年以百年为断(1845-1945)回顾中国史学时,认为通史撰述只有几部是“较近理想的”。从他肯定的几部通史来看,以中华民族作为连续性主体来叙述中国历史是相当重要的。参见王家范:《〈中国史纲〉导读》,张荫麟:《中国史纲》,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13页;顾颉刚:《当代中国史学》,《顾颉刚古史论文集》卷12,第394页。

⑲顾颉刚:《编中国历史之中心问题》,顾洪:《顾颉刚学术文化随笔》,中国青年出版社1998年版,第4-5页。

⑳顾颉刚:《中国之史学》,《宝树园文存》卷2,第294页。

㉑顾颉刚:《禹贡半月刊发刊词》,《顾颉刚古史论文集》卷

5,第363页。《发刊词》由谭其骧作,顾颉刚改定。

⑫顾颉刚:《顾颉刚日记》卷4,1939年6月30日,第244页。

⑬顾颉刚:《考察西北后的感想》,《中国边疆问题及其对策》,《宝树园文存》卷4,第87页,第191页。《学人访问记——历史学家顾颉刚》,《宝树园文存》卷2,第238页。这段话顾颉刚曾反复申说,1936年10月8日,顾颉刚接受《世界日报》记者采访,1938年10月18日在中央政治学校附属蒙藏学校讲演,1942年9月在重庆中央大学、中央组织部及边疆学校各处演讲时都如是说。

⑭顾颉刚:《中国通史与边疆史料》,《宝树园文存》卷4,第339-340页。

⑮顾颉刚:《中国通史与边疆史料》,《宝树园文存》卷4,第340页。

⑯顾颉刚:《致罗家伦》(1927年6月29日),《顾颉刚书信集》卷1,第253页。

⑰顾颉刚:《禹贡学会工作计划》,《宝树园文存》卷4,第227、238页。

⑱顾颉刚:《续论“中华民族是一个”——答费孝通先生》,《益世报·边疆周刊》第20期,1939年5月8日。

⑲顾颉刚:《续论“中华民族是一个”——答费孝通先生(续)》,《益世报·边疆周刊》第23期,1939年5月29日。费孝通、徐杰舜后来也提出了汉族发展的“雪球”理论,认为汉族的形成如雪球般越滚越大,是民族间杂居、混合和融化的产物。费孝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42页;徐杰舜:《雪球:汉民族的人类学分析》,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⑳顾颉刚:《我为什么要写“中华民族是一个”》,《宝树园文存》卷4,第109页。

㉑顾颉刚:《续论“中华民族是一个”——答费孝通先生(续)》,《益世报·边疆周刊》第23期,1939年5月29日。

㉒顾颉刚:《考察西北后的感想》,《中国边疆问题及其对策》,《宝树园文存》卷4,第87、191页。

㉓顾颉刚:《中华民族是一个》,《益世报·边疆周刊》第9期,1939年2月9日。

㉔顾颉刚:《致方豪》(1944年8月13日),《顾颉刚书信集》卷3,第127页。

㉕顾颉刚:《致李文实》(1944年8月5日),《顾颉刚书信集》卷3,第218页。

㉖顾颉刚:《编辑中国名人传说明书》,《宝树园文存》卷1,第22-24页。

㉗顾颉刚:《致白寿彝》(1947年9月23日),《顾颉刚书信集》卷3,第164-165页。

㉘李长银:《未竟的志业:顾颉刚与中国通史编纂》,《史学月刊》2014年第1期。

㉙顾颉刚:《顾颉刚自传》,《宝树园文存》卷6,第419-420页。

㉚顾颉刚:《通史编写》,《顾颉刚读书笔记》卷5,第4页。

㉛郭沫若:《中国历史学上的新纪元》,《进步日报》1951年9月29日。

㉜顾颉刚在1946年的一次访谈中,面对记者的提问:“现代中国史学家最迫切的任务是什么?是编写抗战史?中国通史?西洋通史?还是建立一种正确的史观?”顾颉刚的回答是“编写中国通史”,他还说自己的“史观是唯心唯物二元的”。《顾颉刚论现代中国史学与史学家》,《宝树园文存》卷2,第340页。

㉝顾颉刚:《顾颉刚自述书》,《宝树园文存》卷6,第429页。

㉞顾颉刚:《在政协第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的发言》,《宝树园文存》卷6,第517页。

㉟顾颉刚:《中小学教师进修及文化干部进修案》,《宝树园文存》卷3,第386页。

㊱顾颉刚:《在政协第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发言》,《宝树园文存》卷2,第401页。

㊲顾颉刚:《请另建北京图书馆,以应全国及全世界人民需要案》,《宝树园文存》卷2,第428-430页。

㊳顾颉刚:《明了先民的劳动成果并搜集劳动人民的成绩以为教材》,《宝树园文存》卷3,第375页。

㊴顾颉刚:《(陈懋恒)中国上古史演义序》,《宝树园文存》卷3,第378页。

㊵顾颉刚:《中国史学入门》,《顾颉刚古史论文集》卷12,第453、588-589页。

㊶顾颉刚:《标点二十四史及清史稿应注意的问题》,《宝树园文存》卷2,第459页。

㊷顾颉刚:《整理国史计划书》,《宝树园文存》卷2,第450-453页。

㊸江涓:《怎样认识10至13世纪中华世界的分裂与再统一》,《史学月刊》2019年第6期。